

胡荣华 著

胡荣华 妙局精华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

胡荣华 著

胡荣华妙局精华

陳祖德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 110 号

胡荣华妙局精萃

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

(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
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0.625 插页 9 字数 555 000

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 10001—15000

ISBN 7-5326-0421-7/G · 165

定价:26 元

封面题签：陈祖德

责任编辑：杨柏伟

装帧设计：江小铎

图片摄影：沈惠章 高贵林

萧冠军 郑 迅



胡学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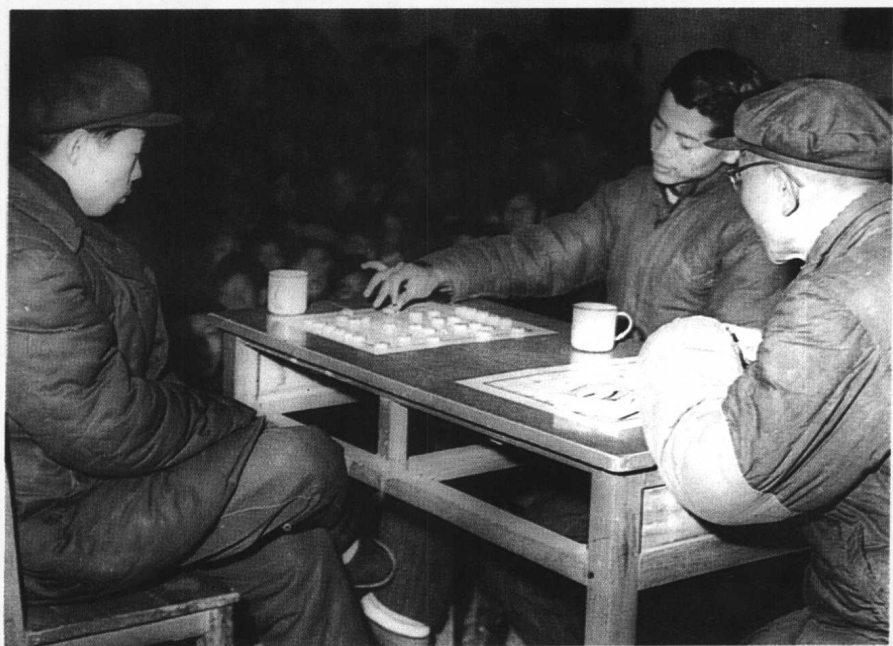
14 岁参加上海市运会象棋比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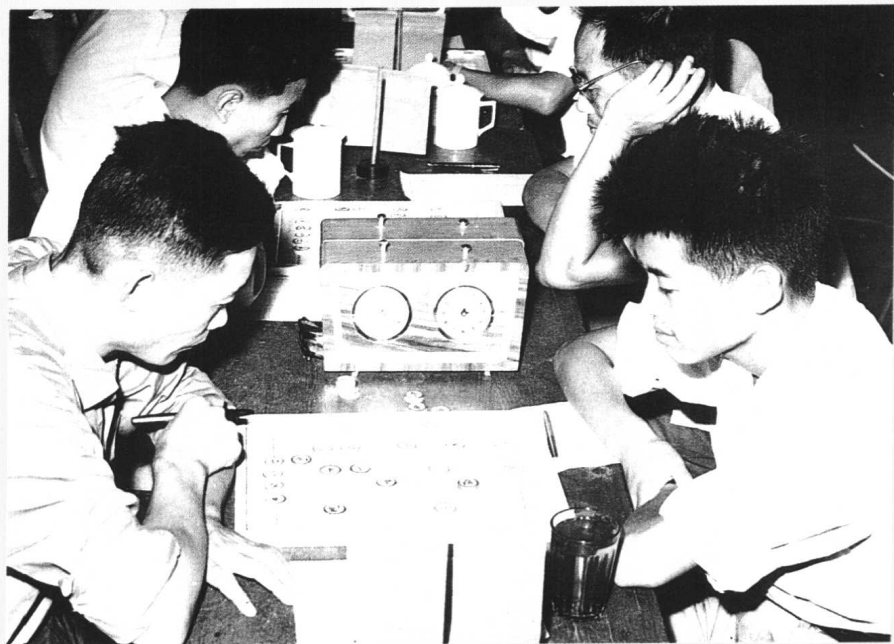
1961 年与杨官璘对弈



1962 年与陈柏祥对弈



1962 年与朱永康在嘉定茶馆下表演赛



在上海市比赛中



为象棋爱好者作车轮战表演



拜会老棋王谢侠逊



1985 年与吕钦对弈



接过帅旗



元帅督战



七星聚会

左起：徐天红、吕钦、胡荣华、许银川、李来群、赵国荣、柳大华



世界冠军的“军师”

左起：胡荣华、徐天红、赵国荣



主帅升帐

左起：李来群、胡荣华、
陈祖德、柳大华

谋而后动



自序

路,从这里开始……

我学象棋大约是在八、九岁的时候,这个年龄在当时似乎已经晚了一点,因为那时报上经常出现六龄童、七龄童等小棋手的名字,在介绍一些象棋名手时,也常常提及他们五岁、六岁就开始弈棋。

我学象棋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应该算是我的父亲,尽管以现在的标准来衡量,他的水平是很低的,但他却使我对象棋产生了很大的兴趣。每天晚上,父亲总是把我和姐姐叫到桌前,教我们下棋。当时,他当然不会想到我真的会成为一名棋手。当时父亲教我们下棋,为的是增添家庭生活的乐趣,又可以不使我们这些孩子因为无事可做而去惹事生非。一开始,我就对三十二个红黑棋子有好感,但水平太差,甚至连姐姐也下不过。

正巧,我住的街道和同幢房屋中,有很多人喜欢下象棋。当时,还有一些在我眼中是相当不错的“高手”,其中有两位曾经常到淮海中路的凌云阁茶楼喝茶下棋。50年代初的凌云阁是上海棋坛名手荟萃的地方,外地棋手到上海,也必定要到那里去“拜访”。因此,就凭“到过凌云阁下棋”这句话,就可赢得人们的尊敬。

我学会车、马、炮走法后,开始在学校里找同学下棋。很快,同学们都不是我的对手了,于是转到里弄找同伴下棋,但年龄相仿的孩子会下棋的不多,我就找大人“比赛”。那些叔叔伯伯也愿意和我下一、两盘。不过大人终究比小孩强,他们先让我车、马、炮,我还要输,可是不久就逐渐只能让车、马,以后只能让单车、双马、单马,直到让先。大约经过两年多的时间,一天傍晚,一位经常和我下棋的叔叔和我下了几盘棋后,终于以郑重的口气说:“以后不能让先了,应该平下了。”我早就盼望他说这句话。这天晚上,我吃饭感到特别香。

我的棋艺有了长进后，父亲、姐姐已不是我的对手，可是却出现了新的矛盾。原先总是笑嘻嘻地看着我和爸爸、姐姐下棋的母亲，却坚决反对我下棋了，有好几次把我的棋子丢到炉子里烧掉。她坚决反对我下棋的理由有两条：一是经常晚回家，二是我下完棋后，喜欢独自一人坐着默想胜负关键的棋，有时吃饭，嘴里含着饭，也在想棋。母亲怕我想棋想入了“魔”，于是采取了烧棋的坚决措施。经过了两次烧了买、买了烧的反复，母亲终于让步了。因为事实证明我既没有想棋入“魔”，也没有因为下棋耽误学校的功课。再加上父亲的支持，母亲终于不再反对我下棋了。

在小学，我很快成了学校的“棋大王”，每天放学回家，先做完功课（那时好像功课不多，我经常在学校里就做好了），就找人“杀几盘”。如果实在找不到人，就到附近的一个棋摊上去看别人下棋。记得当时摆棋摊的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中年人。因为我经常去看棋，所以摊主也认识了我。一天也许是生意比较清淡，摊主就主动招呼我上去和别人下棋，他讲明如果我输了，不用付钱，如果我赢了，就由对手付两分钱。我当时只有十岁多一点，一般大人哪会把我放在眼里，没想到我竟接连胜了几盘，换了几个对手，我一个多钟点里共胜了十二盘。这一来，我大过了棋瘾，摊主也十分高兴，要我经常去玩。因为让小孩招引对手，还是很合算的啊！

从这以后，我的棋路宽了，也结识了不少棋友，棋摊生意也兴隆起来。应该说，在我十一岁的时候，我在街道已经是一个“小棋王”，但是棋艺提高得不快。一天，有位在棋摊上认识的棋友朱翰章，自告奋勇地把我带到肇嘉浜路一所十分简陋的住宅，请一位老师指点我下棋。这位老师就是早年有名的扬州“三剑客”之一——窦国柱。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，我俩走了很多路（当时的肇嘉浜还是条臭水浜），才到了窦老师的家。可是当我们到他家时，窦老师正好午睡，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，窦老师醒了，看到我们这样诚心，他非常感动，赶快拿出棋盘和我下棋。我也不客气，拿起棋就先走了一个当头炮，接着又结成了连环马，开始，窦老师只是漫不经心地随便走走，谁知中盘时

我强渡了一个中兵，使他大吃一惊，费了一番力气，才弈成和局。事后窦老师十分满意地说：“今天我用了五成力量，这小家伙能下和，是个可造之材。”

1957年暑假，炎热的天气使得大家都躲在家里不敢出去，我也因为找不到对手下棋，感到十分无聊。

一天，又有一位下棋“老朋友”到家里来找我，他告诉我，上海市少年宫暑假中将举办中小学生象棋比赛，问我想不想参加，这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，于是请他帮我报名，参加小学生组的比赛。

上海市少年宫，绿茵草地和洁白的楼房，是我十分向往的地方，我虽然是少先队员，也很少有机会进去，现在有机会在里面参加比赛，当然十分高兴了。这位热心的棋友叫傅谔亭，当时在南市区文化馆工作。

傅先生不仅帮我报名，而且经常陪我一起去少年宫，有时还陪我一起回家。每当我回想起这些，总是从心底里涌起一股感激之情。

少年宫的比赛，应该说是相当紧张的。参加的小棋手有上海颇有名气的“六龄童”、“七龄童”、“十龄童”，特别是十龄童，被认为夺标希望最大。可是最后我以不败的战绩夺得了冠军。少年宫奖给我一面三角锦旗和一副象棋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，第一次得到的奖品。发奖结束，我赶快回家，把喜讯告诉父亲、母亲、姐姐、叔叔，还有大大小小的棋友，让他们和我一起高兴。

就是在少年宫比赛时，我见到了象棋界的老前辈——棋王谢侠逊。当时谢老虽然已届古稀之年，但精神矍铄，声音洪亮。他看到我很高兴，让我两先下了一盘棋，结果下成了和棋。谢老拉着我的手高兴地说：“不错，不错。”

少年宫比赛后，我开始有些小名气了。当时有人介绍我到上海城隍庙得意楼茶室内去下棋。城隍庙得意楼当时建在现豫园九曲桥附近，它是上海市象棋表演队的表演场地，也是上海一些名手举行表演比赛的场所。当时表演的程序是先由两位名手对弈表演，然后由我这样的“小不点”与来宾交战，作为余兴节目。一次，两位高手表演

结束，按老规矩，我坐上台等候来宾，这时不知是谁叫喊了一句：请名手跟他下一盘。这突如其来的情况，把大家搞得手足无措。因为对我来说，能和名手下棋，当然再好没有；可是让名手和小孩下棋，却是另一回事，又有谁会愿意呢？整个茶楼静了一会，一位名叫陈昌荣的老棋手笑容满面地走到我面前说：“我陪你下一盘。”陈昌荣先生当时是上海市前六名的好手，我尽管先走，还是很紧张。陈昌荣先生鼓励我说：“没有关系，心定点下好了。”这才使我下得比较放松，经过近一小时的鏖战，我竟意外地胜了这盘棋，这下引起了全场极大的轰动。赛后，陈老师摸着我的头说：“小鬼，你下得不错。”我仰着头看着他的笑容，就是这短短的一句话，使我强烈地感受到棋坛前辈的热情鼓励和期望。直到现在，我仍能清晰地记得这使我永生难忘、感人肺腑的情景。

得意楼与陈昌荣先生下棋的消息，不胫而走，传遍了上海象棋界。如果说，我在少年宫夺得小学生组冠军是在孩子中称雄的话，那得意楼一战就为我进入成人队伍敞开了大门。就是在表演队里，我认识了另一位老师徐大庆先生。他是我棋坛生涯中给我影响较大的一位老师。他不仅热情指导我下棋，并且想方设法把我带到重大棋赛上去经风雨、见世面。每星期有一个下午，让我到大世界游乐场去应战来宾。当时大世界的象棋活动开展得很活跃，我曾在那里和本市各个街道的一些“弄堂大王”比试高低，并从和他们的交锋中得到很好的锻炼。

但是，仅仅这样下棋，毕竟难以深造。于是徐大庆老师就把我带到淮海公园茶室。50年代后期的淮海公园茶室汇集了上海和外地的象棋名手，通过徐大庆老师的介绍，我得到过何顺安、徐天利、惠颂祥、李义庭等名手的实战辅导。这些名师的精湛棋艺和高尚品格，使我进入了象棋领域的新天地。

1959年1月，我终于进入了上海市象棋集训队。当时队里除了有何顺安、徐天利、屠景明等老师外，还有一位大师兄陈奇。我初到上海队，就像一个初中学生一下子来到高等学府。几位老师过去在

淮海公园辅导过我，现在却成了朝夕相处的队友。在队内他们都关心我这个小学生，天天和我下棋，帮我复盘，分析哪一步棋下得好，哪一步棋下得不好。但使我伤心的是，进队好几个月，我是下一盘输一盘，好像他们的棋艺永远是高不可攀、深不可及。唯一可以放心的是，我输了以后，他们从不责怪，总是鼓励我“好好地再想一想”。连续输了几个月后，终于出现了转机，我和何顺安老师对弈时和了一盘，这是我在上海棋队的“零的突破”。何顺安惊喜地说：“小鬼，不简单呀！”那一天我感到天空特别高、特别蓝、特别晴朗。

5月，我参加了上海市第二届运动会，得了个人第七名。8月，在秋季棋类比赛中获得第四名。10月的秋季运动会上，象棋作为表演项目，我又获得了第三名。这几次比赛给了我极大的教益。在一盘比较关键的比赛中，我和一位年纪比我稍大一些的棋手对阵，从棋枰上看，我掌握了主动，这时轮到对方走子，只见他走了一步棋以后“唔”了一声，并作了个想悔棋的动作，我一看，原来我有机会可以抽他的车，于是不假思索地挥炮“将军”、“抽车”，谁知当我炮轰中兵时，对方不慌不忙地把中炮反轰过来，来了个反“将军”，反而抽掉我一个车。我眼巴巴地看着这盘有希望赢的棋输掉了，难过得真想掉泪。事后，徐天利老师狠狠地批评了我，问我为什么这样冒冒失失地走棋？我委屈地回答，怕对方悔棋。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，何顺安问我：“你知道落子无悔吗？”“知道。”“那为什么要担心对方悔棋呢？”是啊！只要对方的棋落在棋盘上，就不能悔棋了，这个最基本的道理，我怎么会忘了呢？现在回想，当然感到可笑，可是当时却给了我一次很深的教训。

1959年确实是不平常的一年，这一年，广东杨官璘来上海访问比赛。杨官璘是我从小学棋以来就十分崇拜的第一位象棋高手。他来到上海棋队，我没有资格正式上场比赛，只是跟在大人后面看他比赛。一次何顺安老师叫我跟他学一盘棋，并笑着对杨说：“老杨，请你指导这小鬼一盘。”杨官璘笑着点点头。我高兴地在棋桌旁坐下，拘谨地走了第一步。说实话，面对着这位象棋大宗师，我心里实在很紧